



05

镜中的忧郁

关于波德莱尔的三篇阐释

[瑞士] 让·斯塔罗宾斯基 著 郭宏安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Jean Starobinski

La mélancolie au miroir

Trois lectures de Baudelair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轻与重

FESTINA 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镜中的忧郁

关于波德莱尔的三篇阐释

[瑞士] 让·斯塔罗宾斯基 著 郭宏安 译

Jean Starobinski

La mélancolie au miroir
des de Baudelai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中的忧郁:关于波德莱尔的三篇阐释/(瑞士)斯塔罗宾斯基著;郭宏安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617-9509-5

I. ①镜… II. ①斯… ②郭… III. ①波德莱尔, C. (1821 ~ 1867) — 诗歌研究

IV. ① I56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3054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La mélancolie au miroir : Trois lectures de Baudelaire

by Jean Starobinski

Copyright © Editions Julliard, Paris, 1989, 1997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Julliard through Garance Agent Littérair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1-473 号

镜中的忧郁:关于波德莱尔的三篇阐释

著者 (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

译者 郭宏安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75千字

版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9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17-9509-5 I·903

定价 29.0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目 录

译序 /1

序言 /51

前言 /55

1 《忧郁，在正午》/59

2 反讽与反省：《自怨者》与《无可救药》/77

3 低垂的头：《天鹅》/101

4 最后的镜子 /143

注释说明 /157

附录 1 波佩的面纱 /159

附录 2 批评的关系 /187

让·斯塔罗宾斯基的作品 /219

译 序

让·斯塔罗宾斯基先生今年 92 岁了，仍然兢兢业业地筹划着未来。记得他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2012 年是卢梭诞生 300 周年，2013 年是狄德罗诞生 300 周年。即时我将汇集关于狄德罗的研究，同时将关于卢梭的文章集成一本新书。当然我不会忘记将关于上个世纪的作家的文章编成一个集子。许多任务在等着我。……我已经太久地忘了时光不会倒流。”好一个“时光不会倒流”！他的著作、学位、职务和国内外的学衔，列成一张表，可以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的著述涉及的领域之广且深，鲜有人可比。加在他头上的名

号可以是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语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音乐学家，等等。他不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吗？2010年，瑞士伯尔尼国家图书馆以他捐献的4万册图书建立了让·斯塔罗宾斯基国际研究中心。

一

1920年11月，让·斯塔罗宾斯基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波兰移民家庭，父母都是医生。一般来说，瑞士的医生都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们秉承古典医学的传统，喜欢文学、哲学和历史，特别是音乐。举行家庭音乐会度过工作的余暇时光，是他们的传统，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家庭每个星期都举行类似的活动，让·斯塔罗宾斯基本人就弹得一手好钢琴。他的父亲是1913年来到日内瓦求学的，先是学哲学，后来出于谋生的考虑，转到医学，成了一名医生，但是毕生保持了对哲学和文学的热爱。1942年，在日内瓦大学文学系学习文学的后期，职业的

稳定，家庭的传统，医学通过精神分析与文学的联系，都促使让·斯塔罗宾斯基选择了医学作为文学和哲学的继续。尤其是他当时结识了法国诗人彼埃尔·让·儒佛，他的妻子布朗什·勒维尔松是一位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让·斯塔罗宾斯基看到了医学和文学的接触点。他认为，物理学和化学是医学的基础，学习这两门科学并不会导致放弃他所喜欢的文学。医学注重事实，其任务是治病救人，而文学注重价值胜过事实，如果两者结合起来，会给文学批评打开新的局面：恰当地提出问题，然后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文学批评上的“辨别”和医学上的“诊断”是两个有着亲属关系的词，“符号学”是文学批评和精神分析学共有的词汇。1948至1953年，他在日内瓦州立医院当内科医生，1953至1956年，他应乔治·布莱的邀请，远赴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法国文学，同时继续医学的深造。

20世纪40年代，是让·斯塔罗宾斯基成长的关键时期，是他学术生涯开始的富有成果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由于其中立的态度，使日内瓦成为欧洲知识分子大聚会、法德文化大交融的地方。让·斯塔罗

宾斯基作为犹太人和外国人的身份（他 1948 年才获得瑞士国籍），正好站在新旧欧洲、法德文化的交接点上。他完成了文学和医学的高等教育，结识了大批欧洲著名的知识分子。1946 年，在马塞尔·莱蒙等人的鼓动下，召开了日内瓦国际大会，吸引了全世界的著名知识分子，如卡尔·雅思贝尔斯、乔治·卢卡奇、让-保尔·萨特、保尔·艾吕雅、安德烈·马尔罗、德尼斯·德·鲁日蒙等。日内瓦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谈论国际问题的场所，此后每年一次的聚会见证了让·斯塔罗宾斯基出色的组织能力。从 1967 年开始，让·斯塔罗宾斯基一直担任该大会的主席，直到 1996 年，这时他已经 76 岁了。

1953 年秋天，让·斯塔罗宾斯基到了美国的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除了乔治·布莱之外，他又结识了德国语文学家列奥·斯皮策。他目睹了两位批评大家之间关于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几乎每日都进行的辩论，他们并不因友谊的存在而稍减其论战的锋芒。让·斯塔罗宾斯基没有参与论战，但是他为对立的双方的著作分别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1961 年，乔治·布莱出版了《圆的变形》，让·斯塔罗宾斯基在序言中写道：“列

奥·斯皮策满怀激情地主张，接近文学文本必须采取美学的和形式的方法，而乔治·布莱则对他自己的方向更为坚定，就是说，反形式主义的主观性的方向，他从此没有任何改变。乔治·布莱对作家思想的注意穿过文本的语言层次就像穿过一个视觉上中性的地带：它直击精神的经验，就像它在作品达到了特别清醒的程度时所表现的那样。对研究对象的意识的迅速认同，通过直觉达到的紧密的同谋关系，直达目的，以至于不再需要求助于语义学的方法和风格学的分析所提供的辅助的迹象，就像奥尔巴赫与斯皮策所做的那样。”^①而他在为列奥·斯皮策的著作《风格论》（1970年）所写的序言中，则写道：

“这种纯粹的语言学对他来说具有中心的、战略性的地位，是一种‘源知识’……作为一种与意义有关联的科学，语言学又有一种阐释能力，其介入在任何一种有言语要阅读、有意义要辨认的地方都是适宜的。”列奥·斯皮策抵制了一种创立系统的批评理论的诱惑，他不愿意被囚禁在一个僵硬的框架之中，“他更喜欢每日进行阐

① 见让·斯塔罗宾斯基为乔治·布莱《圆的变形》所作的序言，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巴黎，1961年，第8—9页。

释，体会鲜活的经验，接受巨大的好奇心的刺激，受到既反对精神局限又反对方法论狂热的细腻精神的影响”。让·斯塔罗宾斯基勾画出列奥·斯皮策的整个认识过程：从对一个文本的整体意思的暂时理解出发，然后研究一个个表面上处于边缘的细节，运用一切科学的和直觉的知识的资源，把阐明的细节与预感到的整体相对照，找出其间的含义，寻找正在逐渐变得明确的意义的新细节，不忽略可能出现的异议和怀疑，始终警惕不使分析活动服务于偏见：“由整体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的往返，期间确立了一种文本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的明晰，这种明晰任何仔细的阅读都隐约地看到了，但是由解释的功能渐渐地明确起来。”^① 让·斯塔罗宾斯基在乔治·布莱与列奥·斯皮策的论证中采取的居间立场说明，他不是一个人喜欢争论的人，他善于从对立中采撷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以形成独特的看法和立场。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让·斯塔罗宾斯基讲授法国文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医学，只不过是他在

^① 见让·斯塔罗宾斯基为列奥·斯皮策《风格论》所作的序言，伽利玛出版社，巴黎，1970年，第10、12、30、35页。

暂时地放弃了执业医师的职业而已。如果说他在职业上有所转向的话，那就是他由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转向了医学史的研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出色的医院，让·斯塔罗宾斯基经常去那里听课，例如临床医学、病理学、精神病学、神经学等，尤其是它有一个医学史研究所和一批著名的学者，例如欧塞·唐金、鲁德维格·依德尔斯坦等，他定期地上他们的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思想史俱乐部可能是他获益最多的地方，那里定期的聚会集中了不少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和语文学家，这个俱乐部为他的两种活动——文学和医学，搭建了一座桥梁。果然，他回国后不久，1958年，他被任命为日内瓦大学教授，主讲的正是思想史。1958年—1959年，他在洛桑大学完成了医学博士论文《1900年之前的忧郁症治疗史》，在此之前的1957年，他已经完成了文学博士论文《让-雅克·卢梭：透明与障碍》。他拥有了两个博士学位，完全满足了他感兴趣的教学活动的执业条件，他自认“很有运气”^①。1965年，他被任命

^① 见让·斯塔罗宾斯基：《话有一半是说者的……》，日内瓦，拉多加那出版社，2009年，第19页。